

有人说,选择哪所大学,决定了你的知识,选择哪座城市,决定了你的见识。作为上海大学的校长,我想谈谈我们的城市,我们的大学和我们青年人。

我是1985年考取博士生后来到上海的。当时上海的城市面貌与1949年刚解放时差别不太大。浦东到处都是棚户区或者大片的农田,上海人常说“宁要浦西一张床,不要浦东一间房”。2017年上海GDP总量突破3万亿元,是1978年的109倍。改革开放40年,从国产大飞机“上天”、上海港“入海”,到黄浦江岸线开放、海派人文环境的打造,上海向世界展现的不仅是高度和速度,更是温度和气度。求学上海,意味着将生活在一座名副其实的超级大都市。上海的面积6340平方公里,相当于4个伦敦、3个东京;常住人口2400万,相当于3个伦敦、2个东京。运营里程世界第一的轨道交通,平均每天客流量近1000万人次。求学上海,意味着将始终与年轻并肩同行。上海是属于青年的,就连“青年”这个汉语词汇,最早也是光绪年间出现在上海。求学上海,还意味着将拥抱多元世界。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超过20万,上大的国际生也超过4000人。上大人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,还有丰富的职业发展机会,各类顶级体育赛事和精彩的文艺演出,以及来自全世界的友谊与竞争。

我被告知,今年入学的新生有70%是“00后”。在我们刚刚学会如何与“00后”相处时,又迎来了开启新纪元的一代,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同样既兴奋又忐忑。一些调查报告显示,更优渥的家庭条件和成长环境让他们发展出了更加独立、开放、多元、自主的个性。他们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,常常能在课堂上与老师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;他们尊重兴趣,选择专业更加遵从本心;他们热爱学习,信息获取能力普遍较强,而且愿意为知识付费;他们内心丰富,对他人的有着深切的关怀,并知道

寻找梅子涵教授

富晓春

这个夏天,参加上海书展新书《报人赵超构》签售,有一件颇为遗憾的事便是错过了梅子涵教授。当我结束签售,陪同嘉宾外出小酌,午后再赶回书展现场时,梅子涵教授《会说话的汉字》签售会已散场。我独自站在如潮水般涌动的书海人流中,手上拿着一本原想送给梅子涵教授的新书怅然若失。

我与梅子涵教授不熟,从未见过面。在我这个岁数,早已过了“追星”的年月。我原打算在他签售时,与他见个面,并将赠书交给他。我是在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副刊“子涵夜话”专栏上,读到 he 写给成年人的几篇散文而喜欢上他的。从此读他没商量,像一个孩童追寻着他的文字语言,在自我的遐想中思绪飞扬……

梅子涵教授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,是我父辈级的长者。他的文章口语化,语境独特,似一个不谙世事、傻里傻气、啰嗦还带点结巴的孩童。一个大老哥们喜欢一个儿童文学作家,我问,是我的心智还停留在孩童的状态吗?可我就是喜欢。

梅子涵教授的散文是用孩童般干净的视角来写的,他带我们走进孩童眼里别样的成人世界。在他的笔端下,总有一片天空,特别清澈、明亮,单纯如稚子。他絮絮叨叨,没完没了,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可以用来叙述,但娓娓道来之间,总能让人读出一有趣的事情来。他用最浅显的孩童也能读懂的文字语言,道出最深刻的成人才能感悟的人生意蕴。读他的文字,飞逝的时光会慢下来,嘈杂的世界会静下来。在那里,我们可以自由散漫,可以张开双臂行走属于自己的天空。做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,站立于天地之间,听到什么就是什么,看到什么就是什么。

这对于一个人来说,是多么的重要啊!

多少年来,原来我一直在寻找梅子涵教授。那本原来准备送给梅子涵教授的新书,被我带回了家,摆放在我书房案头醒目的地方。我还是要送给他,亲手送给我喜欢的梅子涵教授。今年的书展错过了,以后还会有机会吗?梅子涵教授会读到我写的这篇文章吗?我在赠书的扉页上写着我内心最想说的话:“我多么渴望,像孩童一样阅读,像孩童一样写作,像孩童一样飞翔……”

感恩;他们也有自己的压力,听说一些同学已经开始焦虑发际线了。

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。从他们身上,我看到了很多与上海这座城市所相称的优秀品质。这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履行好上海大学的

你好,求学上海的年青人

金东寒

使命,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全球视野、公民意识、人文情怀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栋梁之才。

上海大学赓续了红色的血脉基因。“老上海大学”由国共合作创办于1922年10月,时任校长于右任,总务长邓中夏,教务长瞿秋白,享有“武有黄埔,文有上大”之美誉。这所红色学府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五年,却吸引了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,聚集了一大批有使命感的名师贤达,在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1994年5月,上海工业大学、上海科学技术大学、原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,成立了现在的上海大学。著名的科学家、教育家“三钱”之一的钱伟长先生任校长。

钱校长以语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大学历史系。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“九·一八事变”,钱先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就火了,“马上下决心不学历史,要学造飞机大炮”,遂决定弃文从理。可他入学考试物理才5分,英语0分,数学和化学一共20分。几经周折,学校教务人员和老师被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,同意他暂时读物理系,条件是保证在学年结束时物理和微积分的成绩都要超过70分,同时选修化学,还要加强体育锻炼。结果大家都知道了,钱先生后来被誉为近代力学之父。钱先生的身高也从刚入学时的1米

49长到了毕业时的1米66,还因为足球踢得好,代表中国远赴菲律宾参加了远东运动会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是:“我没有专业,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。”他36岁学力学,44岁学俄语,58岁学电池知识,64岁以后才学计算机,人们看到了钱校长的逆袭,却鲜有看到他成功背后坚持不懈的拼搏和自强不息的精神。正因为如此,钱校长为

上海大学提的校训是:自强不息;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

当今世界处处充满了诱惑。老一辈人常常采用拒绝使用现代化产品来避免被诱惑。比如:我的博士导师就一直不想淘汰黑白电视,并限制自己每天只看30分钟的新闻联播。前几天来我们上大的谢院士就不使用智能手机,只使用手机的通话和短信两个基本功能,以避免受到其他干扰。我相信年青人一定有更好的拒绝诱惑的办法。

《管子》中说:“海不辞滴水,故能成其大;山不辞土石,故能成其高。”面朝大海,上海悦纳每一个梦想,正是这种开阔胸襟,成就了上海。人也是一样的。英国诗人约翰·多恩说,“没有谁像一座孤岛,在大海里独踞;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,连接成整个陆地。”怎样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合作?如何与多姿多彩的世界共处?有人说:想要走得快,就单独上路;想要走得远,就结伴同行。

请牢记自己的使命:世界等待着你们去改变,为此,年青人需要学会学习,学会共处,学会做事,学会做人。大学期间,学习是主要任务。青春需要自强奋斗:处优而不养尊,受挫而不短志,这正是上大人的精神品格。

来拉萨,特意住在大昭寺旁,出行是悠长的石板路,藏人川流不息。

远处有个红衣少年一路长叩过来,护身的黑围裙沾满沙土。他眼神晶莹,神色专注,透发着灵气。未来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僧人?世路艰难,入世与出世各有甘苦,心漂流到哪里,就微笑着栖息。慧悟的人不分物我,不计虚实,不分世俗与胜义,纯真自然而已。想到这儿,不禁惭愧刚才对红衣少年的猜想。

视野里最多的是五星红旗,与五彩经幡和金色宝顶同辉。大昭寺前,有建造于公元823年的“唐蕃会盟碑”,映照

对于国内绝大多数乐迷来说,蒙塞拉·菲格拉斯是个稍稍有些陌生的名字,她是加泰罗尼亚早期音乐女高音,维奥尔琴大师约第·萨瓦尔的妻子和重要的合作者。如果你看过电影《日出时让悲伤终结》,你肯定会迷上那些属于萨瓦尔家族的音乐,迷上蒙塞拉·菲格拉斯那空灵、高贵、诚挚、神秘中透着古朴的歌声,她的声音里有爱,有悲伤,有渴望,有阳光明媚青春动人,更有罕见的尊严和优雅。

那张堪称经典的摇篮曲精选《Ninna Nanna 1500-2002》,时间跨度长达五个世纪,而在地域上则几乎贯穿了整个欧洲。从葡萄牙民谣到温柔的英国歌曲,从爱琴海岛屿到撒哈拉沙漠边缘贝伯乡村

只为在此与你相见

梁永安

发,驱车经318国道来到拉萨,心里弥漫着重神秘和好奇。这回是第三次进藏,神奇感渐渐散去,和藏族人已经是一家的感觉。攀登过很多高山,穿行过很多大河,遇见过很多民族的人们,经过得多了,才真正知道“中国”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,而是家。要热爱她,更不是美丽的纸上作业,不放下羁绊,不走走自己国家的四面八方,哪里会真正做好一个中国人!古人说“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”,直到今天,才深切领会到其中的深意。

拉斯纯粹、优雅唱腔使我想起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诗句:“种种欢乐和痛苦涌起,一想到夏天的绿叶和冬天的残枝这些才是衡量她的灵魂的尺度。”

日出时让悲伤终结

阎逸

基和马克斯雷格的作品,到当代作曲家帕特所写的两首歌曲,无一不是来自亲情的美学体验。在众多演奏名家的烘托下,蒙塞拉·菲格拉斯用她充满魔力的声音,准确表达了各个摇篮曲的忧郁、哀怨与愉悦。摇篮曲就像时间的魔法,在野草的时代为我们拯救着绿色,聆听它,每个人都会从中发现童年,发现那种感人至深的纯真和梦想。

菲格拉斯的音乐介于歌剧与乡村牧歌之间,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,她演唱蒙特威尔第的牧歌和加泰罗尼亚传统的圣诞夜歌,同样都是一种自然的升华,借助当代非凡的音响技术,你可以听到春天的芳香和阳光照耀的土壤,当然,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,你得学会打开心灵的耳朵,然后慢慢进入音乐的奇境。在非格拉斯的唱片中,我喜欢的是《女性之光》。这是一张向古代女性致敬的唱片,也是关于女人的音乐故事。十五首古曲涵盖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,意图召唤并呈现古代西方女性的七种面貌:神秘,官能美,母性,爱情,哀叹,喜悦,智慧。非格

拉斯在西班牙家中病逝,享年69岁。那一天,我重看了一遍《日出时让悲伤终结》,这部悲伤得近乎有些平淡的影片,不知道看了多少次,依然是充盈着水粉画的色调和梦游般的恍惚感,依然是以音乐的元素为核心,赚了我的泪水。影片中没有多少人物的对话,有的只是琴声如诉,以及低回的旁白。或许沉默是一种内在的语言,而音乐是用来表达那些语言表达不了的东西。影片结尾处,老师圣哥伦布与他的学生马莱斯科的那首《悲哀之墓》,可以看作是剧中人玛德琳的涅槃和新生,他们在各自的回忆里与她相视而泣。

当约第·萨瓦尔再次演奏他的维奥尔琴时,肯定是会与蒙塞拉·菲格拉斯重遇的。只是,脸上奔跑着泪水,琴声哭泣在灵魂深处,那把心事重重抵死缠绵的维奥尔琴如何能将悲伤终结?日出酷似一首挽歌,所有的早晨都不再回来。



郊外

(纸本彩墨)

李翔

小区里有一块空地,整年荒草萋萋,偶尔来人清理,也不见成效,大家都怪土壤太肥沃,不大好治理。附近一家住户,心血来潮,移来两棵竹子,一年后,冒出几根笋来,孤零零的,并不起眼,不久长成新竹,空地多了点生气。没想第二年春天,竹笋一根接一根爆出,不几日满眼都是,雨后飞速拔节,一天高过一天,没多久出落成一小片竹林,亭亭华盖,嫩绿挺拔,成了小区一道风景。

这片竹林,让我想起了我的博士生。进校时,他们也像破土的竹笋,平平淡淡,无人关注。有的才踏上工作岗位,脸上稚气未消;有的已执教数年,但科研成绩不显;个别的刚获高级职称,仍希望学术上更进一步。他们的研究方向是澳大利亚文学,不过几乎都是零起点。三年读博,大家狠下苦功,补足澳大利亚文学“短板”,并充分利用中澳合作研究项目所获得的经费,去澳大利亚实地考察:或访问研究对象;或在图书馆查找资料,“就地取材”,撰写论文。无论在国还是国外,博士生们都孜孜矻矻,用力甚勤,所付出的努力,外人难以想象,用他们自己的话说“这三年,脱了一层皮”。

2003年起,博士们先后学成离去,分别在高校任职。如今,十几年过去了,当年学术上稚嫩的小树,已长成栋梁之才,还营造出了郁郁葱葱的“小气候”,为学界所瞩目。常

有学者对我说:“你的学生已成为当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中坚,凡是与这有关的研讨会,作主题发言的很多都是你弟子。”此言不虚,他们确已声名在外,研究能力渐长。获得博士学位的8人中,7人已为正教授;2人分别任大学校长和副校长;5人为学院院长、副院长。在学术上各有建树,6人在外国文学研究顶级刊物《外国文学评论》发表文章,其中一人已发了两篇。多人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最早毕业的王光林博士,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,当年深得担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,著名学者陆谷孙教授的赞赏。王后来自己也应邀担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、西澳大利亚大学、卧龙岗大学的博士论文校外审阅人,并在多家外国杂志发表文章,具有与外国同行专家平等“对话”的能力,论文被外国学者多次引用,著名的麦克米伦出版社因此约他出版一部英文专著,并承诺支付稿费(该社一般不主动约稿,而由作者自行联系,自担出版费用)。彭青龙博士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,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成员,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

最珍贵的礼物

黄源深

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会长,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and 一般项目多项,还获得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弘博士,现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常务副会长,已就中澳关系,在国内外报刊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悉尼先驱晨报》、《澳大利亚人报》等发表多篇时评文章,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、凤凰卫视、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、印度国际电视台采访,表明中国学者的看法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博士们个个都很有出息。

他们大多任职于上海高校,相互往来较多,常常隔时相聚,甚至远在牡丹江师范学院担任校长的博士梁中贤教授,也会借着来沪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到场。大家畅叙别后,交流心得,互相激励。此情此景,不由让我想起与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光。那会儿“新生们”面对新课题,新氛围,不知道却急于知道前路如何,脸上露出急切和迷茫。而现在,他们个个都显得那么成熟,那么老练,那么自信,对从事研究的话题,随口能说出一大通道道来。一个教师,目睹这样的变化,恐怕是人生最愉快的时刻。学生的成才,称得上是送给教师的最珍贵的礼物。

师生往来,只要出自真诚,便是正常的。有些时候,“情”与“礼”比“法”更合理。

十日谈

心中的礼物

责编:杨晓晖